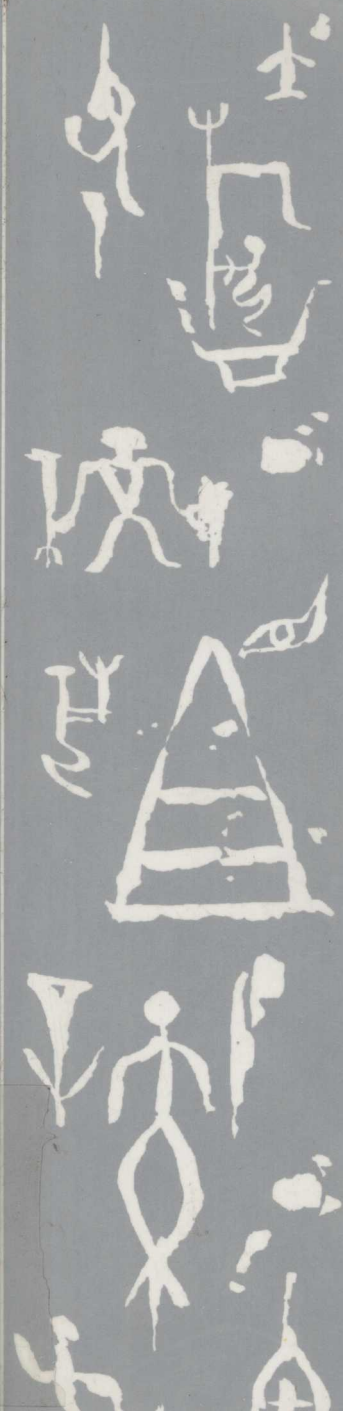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白
对 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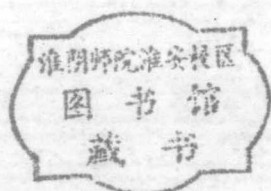
史 记

第一册



文白对照 史记

13756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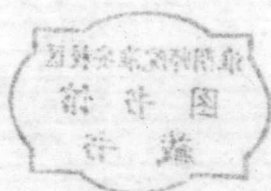
淮阴师院图书馆1294431

第一册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ISBN 7-80504-584-4/K · 188 定价: 128.00元

责任编辑:杨鍾贤



文白 史 记(全四册)
对 照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.6 印张 2,100 千字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04-584-4/K · 188 定价:128 元

翻 译 人 员

(按翻译篇目先后为序)

刘起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著有《尚书评述》、
(著合)《尚书学史》、《尚书源流及传本考》、《日本的尚书学
与其文献》、《古史续辨》、《顾颉刚先生学述》、《刘起
钊经学论集》等书。

林小安 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,撰有《殷武丁臣属征伐与
行祭考》、《武乙文丁卜辞补证》、《“韦编三绝”正
读》、《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》等论文。

裘锡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著有《文字学概要》、《古文字
论集》、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等书。

李 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著有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
书研究》(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)、《战国
鸟书箴铭带钩考释》(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
学家奖)、《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
来源》、《吴孙子发微》、《中国方术学》等,并译有《中
国古代房内考》,主编《中国兵书名著今译》、《中国
方术概观》。

- 吴树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著有《秦汉文献研究》、《风俗通义校释》、《东观汉记校注》、《二十四史简介》、《黄石公三略译注》、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(合著)、《汉英对照论语今译》(合著)等书。整理出版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》等十余种古籍。编有多种工具书。
- 王煦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邀研究员,撰有《公孙龙指物论诠释》、《目录学研究对象商榷》、《统治阶级道德继承问题》等论文。
- 李解民 中华书局副编审,著有《尉繚子注译》、《白话续资治通鉴》(合著)、《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》(合著)、《白话资治通鉴》(合著)、《文白对照资治通鉴》(合著)、《白话二十五史精选》(合著)、《兵家宝鉴》(合著)等书,撰有《开阡陌辨正》、《云梦秦简所载魏律研究》、《刘氏书录研究》等十几篇论文,点校《簪曝杂记》、《竹叶亭杂记》、《春秋左传诂》、《春秋大事表》等多部古籍。
- 缪文远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,著有《战国策考辨》、《战国策新释》、《七国考订补》等书。
- 骈宇騫 中华书局副编审,著有银雀山汉墓竹简《晏子春秋校释》一书,撰有《银雀山竹简〈王兵〉篇研究》、《帛书〈春秋事语〉初探》等论文。整理《历代刑法考》、《谷梁补注》、《问字堂集》、《旧京琐记》等古籍。
- 盛冬铃 中华书局副编审,著有《六韬注译》、《那兰性德词选》等书,撰有《西周铜器铭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》、《清初第一词人那兰性德》等论文,整理《松窗

《梦语》、《治世余闻》、《继世纪闻》等古籍。

赵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,著有《中国古代石刻概论》、《华夏衣冠五千年》、《唐代墓志汇编》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等书。

王文锦 中华书局编审,校点整理《通典》、《周礼正义》等古籍。

阴法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著有《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》等书,撰有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、文化史的论文多篇,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化史》一书,与人合作点校《隋书》。

陈久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,著有《彝族天文学史》、《天文学简史》、《藏历的原理与实践》、《中国节庆及其起源》、《陈久金集》。校点《中国方术概观》中《式法卷》、《星命卷》。

魏嵩山 复旦大学副教授,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,与人合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撰有《太湖流域开发探源》、《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》等论文。

蒋非非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,撰有《算赋制度问题探讨》、《秦汉移民实边政策简论》等论文。

魏连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撰有《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》、《文天祥家书诗帖考释》、《顾炎武北方交游考》等论文三十余篇。整理《弇山堂别集》、《玉堂丛语》、《典故纪闻》、《三垣笔记》等多种古籍。

顾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编审,编有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,撰有《试论“三年丧”起源》等论文。

陈绍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,撰有《百越与匈奴

衣食住行之比较研究》、《试论王莽改币》、《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》等论文。
 师小平 北京古籍出版社编辑,曾参加过《管子》、《历代题画诗》等书点校工作,著有《聊斋选注》(合作)等书。

陈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,与人合著《商周古文字读本》,编有《永乐大典古方志辑佚》、《全唐诗索引》(合编),点校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、《今文尚书考证》、《订讹类编》等,曾参加《辞源》修订及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一卷编写工作。

胡平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,著有《阜阳汉简诗经研究》、《孝经评述》、《中国古代文化史·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》等书,撰有《阜阳汉简苍颉篇的初步研究》、《阜阳汉简年表整理札记》、《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》、《木简券书制度考》等论文。

何法周 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,著有《韩愈新论》、《侯方域集校笺》(与人合著)、《唐文选》(与人共同主编)、《李贺诗选》(与人合著)等书。

李祖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审,与人合著《中国古代分期讨论五十年》一书,主编《中国古代改革家》、《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传》、《中国古代军制史》、《孙子研究新论》等书。

马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,编有《秦汉赋役资料辑录》一书,点校《两汉博闻》,担任《白话资治通鉴》一书副主编。

段书安 文物出版社副编审,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编委。曾参加过《管子点校》、《孟子译注》等古籍整理工作,参与

编辑出版《中国美术全集》等书。

施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著有《司马迁研究新论》(合著)、《中国史学简史》、《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》等书。

李晓林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东直门医院内科主治医师,著有《杂病源流犀烛校注》(合作)一书,发表过多篇中医论文。

刘 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,撰有《区田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》、《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》、《北魏末期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》、《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》、《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》等论文。

杨世钰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,著有《云南省志·地理志·云南省建置沿革》等书,撰有《南诏的统治制度及其特点》、《孟子名本思想浅议》等论文,主编《大理丛书》。

谢桂荣 河南大学副研究馆员,撰有《侯方域年谱》、《范仲淹师承问题考辨》、《〈文苑英华〉〈唐文粹〉相互关系考》等论文。

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著有《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·东详编》、《汉文化史纲》(合著)等书,撰有《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向西太平洋地区的传播》、《论唐代初期中日韩关系》等多篇论文。

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,著有《吠哒史研究》、《塞种史研究》等书。

刘宗汉 中华书局编审,撰有《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书研

前言

《史记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,对于汉代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。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,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《通志·总序》中推誉《史记》说:“六经之后,惟有此作。”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,他在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中说:“史迁绝学,《春秋》之后,一人而已。”鲁迅先生对《史记》的评价,那是再精辟不过了,他于所著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认为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,揭明了《史记》的特殊地位。

《史记》这部非凡的史作,出自这位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之手。他字子长,左冯翊夏阳(今陕西韩城县)人,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(公元前145年)。司马迁在孩童时代,“耕牧河山之阳”。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,开始学习古文。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、孔安国学习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汉武帝元朔三年(公元前126年),司马迁二十岁,满怀求知的欲望,漫游名山大川,考察古迹,搜集遗闻,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。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,增长了知识,为尔后撰写《史记》作了很好

的准备。

司马迁结束漫游,返回长安后,出任郎中。郎中虽然位卑秩低,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,又有机会接近皇帝。元鼎年间,武帝或巡行,或祭祀,或封禅,司马迁常为扈从。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司马迁奉武帝之命,出使巴、蜀以南,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。这些活动,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,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。

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,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,这就是其父司马谈。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,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,研究天文历法。司马谈知识渊博,撰有《论六家要旨》,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。司马谈身为太史令,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。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,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。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。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,流泪说:“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,而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。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,汝其念哉!”司马迁俯首流涕,接受了父亲的遗命。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,以顽强的毅力、喷薄的激情完成《史记》,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。

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司马迁出任太史令,从此,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,为撰写《史记》提供了必备的条件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,便开始撰写《史记》,也就是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里提到的“论次其文”。在撰写过程中,横祸降临。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,因孤军深入,被匈奴重兵包围,全军倾覆,李陵投降匈奴。

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，他怀以拳拳之忠，坦陈己见，认为李陵投降，是由于寡不敌众，又无救兵，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。李陵并非真降，是找机会报答汉朝。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，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，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。于是，司马迁身陷囹圄，受了腐刑。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。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，痛不欲生。但他顾念《史记》还没有完成，才隐忍苟活下来。这次腐刑之祸，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，撰写《史记》的动力和境界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往昔的阶段。

三年后，司马迁被赦出狱，担任中书令，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，看似荣耀。但这一官职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。表面上的荣耀，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。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，终于超越了自我，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《史记》之中。

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，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，他回了一封信，即有名的《报任安书》。其中说：“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，凡百三十篇。”看来这时《史记》已经基本写就。

司马迁去世年代，向无定论。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，很难指出确切年代。大体说来，应该卒于武帝末年，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。

据《太史公自序》，《史记》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书名“太史公书”。早期，学术界也把《史记》称作“太史公记”、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记”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。东汉末年，学者著述中，已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三国时期，“史记”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。

《史记》由五个部分组成，最前面的是本纪，下面依次为

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。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，凡时间可考的，均系以年月。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，兼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、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。实际上，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，可视为全书的纲要。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，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，等于诸侯的本纪。个别人物，如孔子、陈涉，虽非王侯，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，所以，也列入世家。张守节《史记·孔子世家正义》说：“孔子无侯伯之位，而称世家者，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宗于夫子，可谓至圣，故为世家。”司马贞《史记·陈涉世家索隐》说：“胜立数月而死，无后，亦称系家者，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，以其首事也。”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。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，上层勋臣士大夫，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，均可入传。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，也撰有专传。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，内容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礼乐、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。表采用表格的形式，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。

《史记》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，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。全书的中心是本纪，世家、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。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、列传，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；而配合世家、列传去阅读本纪，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。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。书则不同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，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。几个部分组合起来，就构成了系统、完整的历史画面。

在《史记》的五个组成部分中，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，是书中的主体。因此，人们把《史记》的体裁称之为“纪传体”。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。从此以后，历代史学

家沿其规制,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,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《史记》以外的二十三史。二十三史和晚出的《清史稿》,虽然在体制上与《史记》不完全相同,如《汉书》无世家,书改称志,一些史既无世家,也无表、书。但是,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,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。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,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,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,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,所以,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,成为各朝“正史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序》说:继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之后,“世有著述,皆拟班、马,以为‘正史’。”到清乾隆年间,钦定以《史记》为首的二十四史为“正史”。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,是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。

《史记》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,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。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,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(公元前122年),一说终于太初年间(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)。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,历时三千年左右。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《史记》,从而使《史记》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,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司马迁之前,也出现过不少史作,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秦记》、《楚汉春秋》等,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。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,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,经济繁荣,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,文化勃兴。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,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。汉兴秦亡,原因何在,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,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。再往上追溯,历代的兴亡,都需要思索,寻找出规律,作为汉代统治者为

政的借鉴。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，完成了他的史作，从远古，到当代，悠远而恢弘，体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。

史书是叙述史事的，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，然后经过剪裁加工，才能熔铸成材料丰富、信而有征的史作。在这一方面，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。他编写《史记》的过程中，取材相当广泛。在《史记》一书中，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。当然，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提到的司马迁修《史记》是“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”，仅这五种书，就有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三种在《史记》中没有言及。由此可以推知，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。除了史籍，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。他身为太史令，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《史记》中有关汉诸侯、功臣诸表，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《功令》、《列封》、《令甲》，舍此而别无他途。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，也是《史记》的重要材料来源。这些材料范围颇广，有对地理的勘察，有对古迹的调查，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，有对当事人的访察，有对歌谣里语的搜集等等，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《史记》的取材范围。

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，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“义例”，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。所谓“义例”，又谓之“书法”、“凡例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。从《史记》本身来寻找，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：第一，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。司马迁在《伯夷列传》中明确地说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

信于六艺。”而“六艺”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，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。所以《孔子世家赞》说：“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。”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，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，或者采录，或者扬弃；另一方面，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，经过剪裁，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。第二，信从原始资料。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，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，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。所以，司马迁在《五帝本纪赞》中提出：“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所谓“古文”，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。此类典籍，产生的时代较早，是司马迁撰修《史记》重点取材范围。有代表性的是古文《尚书》，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，修史时采摘颇多，如果我们把《尧典》与《五帝本纪》、《禹贡》与《夏本纪》、《金縢》与《鲁周公世家》、《微子》与《洪范》与《宋微子世家》略作比勘，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《尚书》。古文《尚书》之外，对古文书写的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典籍，也多有采录。第三，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。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，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，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，大量纳入《史记》。如《淮阴侯列传》载：“吾如淮阴，淮阴人为余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，贫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，良然。”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，人们读起来，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。第四，“择其言尤雅者”。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。司马迁得到的材料，百家杂陈，众说纷纭。面对这些材料，司马迁在《五帝本纪赞》中提出了“择其言尤雅者”的选材原则。他对同一人物、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，进行比较，去伪存真，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。在这一方面，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

记载。从战国至汉初，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，各家著作，没有不大谈黄帝的。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，荒诞不经，用司马迁的话来说：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，他“择其言尤雅者”，只撷取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，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。清代李嗣业《杲堂诗抄》卷四便说：“史公所作《黄帝本纪》，简而雅，质而不夸。”第五，疑难之处，或存疑，或略而不书。由于各种原因，史料歧异，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，本是正常的事情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，难免不失之武断。司马迁在《三代世表》中提出“疑则传疑”，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又提出“疑者阙焉”，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。《史记》中《五帝本纪》、《夏本纪》、《殷本纪》和《三代世表》不标年月，只载世系，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。在取舍材料方面，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，如《大宛列传赞》提出“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”，《天官书》提出“纪异不说不书”，等等。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，取其所当取，弃其所当弃，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。

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，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，他撰写《史记》，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，也可以看出撰写《史记》的宗旨。

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。天人关系，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。殷周时代，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，但都显得非常微弱，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。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，天道不变，王权永恒。任何